

## 一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

汉语经历数千年长时期的发展，语音上有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各地变化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长时期这样巨大的不同的变化，造成了目前各地方言语音纷繁复杂的局面。汉语方言语音变化的原因 变化的方式 变化的过程 以及变化的结果 都很值得探求。

### (一) 语音变化的原因

汉语方言语音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出于发音上省力和方便的要求，引起发音动作的改变。发音上省便的要求使音节内部不同语音成分相互影响，改变了其中一方或双方原有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变得彼此相近或者相同。以下列方言声母的实际音值来说明：

厦 门 福 州 梅 县 南 昌  
九  $\text{'k}^{\text{h}}\text{iu}$   $\text{'k}^{\text{h}}\text{ieu}$   $\text{'ciu}$   $\text{'t}^{\text{h}}\text{iu}$

把这些方言的字音联系起来 可以认为 南昌话见母字‘九’的声母因为前元音的影响而经历过一个腭化的过程：

$\text{k}$   $\text{k}^{\text{h}}$   $\text{c}$   $\text{t}^{\text{h}}$

在这个过程中，舌根音声母为了和前元音的舌位协调，发音部位越

来越向前移动，最后变成了舌面前音。

又如复元音的单化：

	北京	太原	西安	济南	合肥
拜	pæ <sup>3</sup>	paɛ	ɕæ <sup>3</sup>	p <sup>3</sup>	ɕ <sup>3</sup>

蟹摄开口二等韵“拜”字的复元音韵母 ai\* 在北京、太原方言中韵腹和韵尾相互影响，韵腹元音舌位逐渐升高，韵尾元音舌位逐渐降低，彼此逐渐接近；在西安、济南、合肥方言中则合并成了单元音，而且因为元音的舌位偏前而逐渐高化。

相对来说，汉语语音的变化还不是太复杂的。汉语音节结构在上古时期的情况目前存在不同的构拟，但根据《切韵》至少在中古时期要比印欧语系各语言来得简单。汉语也不像印欧语系各语言那样富有多音词，构词多用屈折方式。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多单音词，语音的变化基本上是在音节内部进行的，变化方式相对也要简单得多。

汉语语音的变化大多是由发音上的同化作用引起的，音变种类主要有声母的清化、腭化、弱化，韵母的鼻化、单元音化、复元音化等。也有因异化作用引发的音变，同样也是发音上省力方便要求的结果。例如广州话：

帆	篮	乏蜡
ɬan	lan	fat <sub>2</sub> lɔ <sub>2</sub>

咸摄字“帆”、“乏”的韵尾本来应该和“篮”、“蜡”相同，都是唇音 m，但“帆”、“乏”因为声母也是唇音，发音过程中要求发音部位先在唇部、然后转向其他部位后再转回到唇部。一个音节内同一唇部先后有两个发音动作，显然比较费事。于是，在发音省力方便的要求之下，韵尾被声母所异化，变成了舌尖音 n。这样，“帆”、“乏”二字就不再和“篮”、“蜡”同韵，而和山摄字“兰”lan、“辣”lat<sub>2</sub>同韵了。

还有的语音变化无法用发音机制来说明原因，需要从其他方

面去寻找答案。例为合肥话“鸡”字和“资”字同音，韵母都是 $\eta$ 。“鸡”字的韵母在安徽方言中一般都是 $i$ ，合肥话自身并不能说明 $i$ 音变成 $\eta$ 的原因。但这一答案可以从邻近的和县话找到。比较下面合肥话和和县话各字的读音：

	资	鸡	姐
合肥	t $\eta$	t $\eta$	t $\eta$ i
和县	t $\eta$	t $\eta$ i	t $\eta$

和县话“资”、“鸡”、“姐”这三个古韵母不同的字目前的韵母也都不相同，而合肥话“资”、“鸡”同韵。可以设想，合肥话早期的情况应该是和和县话相似的，只是后来字音发生了变化，“姐”字韵母变成了 $i$ ，“鸡”字韵母变成了 $\eta$ 。可以认为，合肥话“鸡”字韵母的变化是在“姐”字韵母变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姐”字韵母由 $i$ 向 $\eta$ 的变化使“鸡”字韵母由 $i$ 变成了 $\eta$ 。因为只有这样，“鸡”字的韵母虽然变得和“资”字同韵，但仍然能保持和“姐”字韵母的区别。这种由于语音系统要求保持某些特定音类的区别而发生的音变，和发音机制没有直接关系。

## (二) 语音变化的方式

语音的变化大多采用渐变的方式。这是由语言的渐变性决定的。一个语音成分的变化，开始时只在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造成细微的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逐渐积累，就变得越来越明显。随着变化不断进行，差异不断积累，最终结果就是汉语语音古今的巨大差别。

在语音变化的过程中，通常是新的语音形式出现，旧的语音形式消失，二者并不同时存在。而且因为一般情况下语音在一段时间内变化不大，所以音变也不容易被人们所觉察。但有时语音变

化比较快，短短两三代人的时间里就会积累起可以被觉察到的差异 而且新旧语音形式同时存在 表现为老中青口音的不同。例如上海话：

	老①	老②	中	青
雷	le	le	le	lE
来	lE	le	l	lE
兰	l	l	l	E

“雷”、“来”、“兰”三字的韵母分别来自中古蟹摄合口一等、蟹摄开口一等和山摄开口一等。在上海少数老年人的口音“老①”中，三字韵母元音舌位相近，但不相同。不同音值反映不同历史来源，显然“老”是较早的读音。在多数老年人的口音“老②”中，“雷”、“来”韵母元音合流，二字同音。在中年人（包括少数青年人）口音中，“来”、“兰”韵母元音合流，二字同音。看来在“老”和中年人口音中，三字合流的方向并不一致，似乎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但最后青年人（包括少数中年人）口音中“雷”、“来”、“兰”韵母合流，三字同音。这就在两三代人、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项音变，而为人们所觉察。

语音的变化也采用突变的方式，即某一类语音成分由原来的形式突然变成新的形式，中间没有过渡。不过在语音突变的同时，仍然会有其他因素来体现语言的渐变性。比如新旧两种语音形式可以在不同条件下同时存在。以山西五台话为例。五台城区话有两组入声韵：

八	pɛʔ	夹	tɕiʔ	刷	suɛʔ	日	yɛʔ
喝	ɣʔ	钥	iəʔ	骨	kʊʔ	月	yɤʔ

这些入声字可以出现在语句的任何位置上。但在五台走马岭话中，入声字只在非词末位置保留喉塞韵尾。如：

八哥	pɛʔ ɕkə
夹袄	tɕiʔ ŋlɔʔ

刷子 suɛʔ, ʈʰ  
 脊背 tɕʰ, pei  
 钥匙 iəʔ, ʃʰ  
 骨毒<sup>\*</sup>(拳头) ʌʔ, tɕʰ  
 月明 yəʔ, mi

单念时或出现在词末位置时则失落喉塞韵尾，韵母转入阴声韵。  
如：

八 pa, 夹 ʈʰiə, 刷 suə 日 ya,  
 脊 tɕʰ, ʈʰ 钥 iə, 骨 kɕʰ, 月 yə,

这样，五台走马岭话的入声韵就先于城区话开始了消亡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入声韵向阴声韵的变化从音值来看是突然的，中间没有韵尾的变化作为过渡。不过，在一种语音条件下保留入声韵，在另一种语音条件下变成阴声韵，体现了语言的渐变性。

语音变化采取突变方式，变化条件也可以是非语音的。例如北京话 ue 韵母阳平调“危微”等字向阴平调的变化。变化也是突然发生的，或是读阳平，或是读阴平，中间没有调值的过渡。因此这种变化也不是渐变，而是突变。这些字发生音变的语音条件相同。但是不是发生音变，音变的早晚和快慢，却因词而异，即取决于词汇的条件。如“危微微巍”等字阳平、阴平两读由来已久，大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目前以读阴平为常，《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也已经确定为阴平字。“唯惟维违”等字在口语中开始出现阴平一读，则要晚得多，目前阳平和阴平两读，阴平的读法还没有被规范所认可。而“围为桅”等字则目前仍然只有阳平一读，还没有什么变化。这些字在音变过程中所处阶段的不同，可以表示如下：

②

危微微巍

唯惟维违

围为桅

指音变已经完成，指音变正在进行，指音变还没有发生。这种音变方式就是王士元所说的“词汇扩散”。变化在语音上表现为突变，但在词汇方面有先有后，因此被称为离散式音变，仍然体现了语言的渐变性。

### (三) 语音变化的规律性

语音变化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同样的语音条件引发同样的语音变化，不管这种条件所涉及的语音成分数量的多少。以北京话古全浊声母字为例，声母清化后其中塞音塞擦音有的送气，有的不送气。例如：

铜(平) 动(上) 洞(去) 独(入)

$\text{t}^h\text{u}ŋ$        $\text{t}^h\text{u}ŋ^3$        $\text{t}^h\text{u}ŋ^4$        $\text{t}^h\text{u}$

送气不送气取决于古调类，变化的规律即是平声送气，仄声(上、去、入)不送气。

但人们发现，语音变化常有例外现象，无法以音变规律来说明。比如浊入字“突”、“特”北京话声母应该是不送气音，实际上却是送气音，读作 $\text{t}^h\text{t}$ 和 $\text{t}^h\text{t}$ ；“渗”所禁切，生母沁韵，潮州话应该读作 $\text{st}^h\text{ɛn}$ ，实际上却读作 $\text{ts}^h\text{an}$ ；“糙”去声字，北京话却读作 $\text{t}^h\text{s}^h\text{au}$ 阴平；“蕊”止摄合口字，苏州话韵母应该是 $y$ ，实际上读 $i\text{y}$ ，和流摄字同韵，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音变规律的例外。

语音变化的例外按理是可以找到原因的。比如上面所说的北京话“突”在《广韵》中有陀骨、他骨两个反切，读音 $\text{t}^h\text{t}$ 的来源不是陀骨切，而是他骨切。潮州话“渗”字是声旁“参”(参加) $\text{ts}^h\text{an}$ 引起的误读，北京话“糙”是因为避讳某个字音而改变了读音，苏州话“蕊”则是借用了流摄字“纽”(花纽头) $\text{ni}^h\text{y}$ 的读音，是一种训读，等等。

不过以上例外都是由语言使用中的社会心理现象或是文献材料方面的困难造成的，并不是语音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例外。真正意义的例外，原因要从下面两个方面去寻找。

### 1. 不同音变规律的影响

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本来某字的变化应该受某一语音条件支配，但因为另一语音条件的影响，改变了应有的变化方向，成为例外。例如西安话“女猫”一词中的“女” $n_i$ （常写成“咪”）作为泥母鱼韵字，应该和“女”字在其他使用场合中一样读作 $^c_{n_i}y$ 。不过，联系其他方言来观察，可以发现汉语方言中鼻音声母发音部位转移而发音方法不变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比如合肥“泥”（泥） $^c_{n_i}m_i$ ，建瓯“尼”（泥） $n_i$ ，“日”（日） $n_i$ ，苏州“蚊”（疑） $n_i$ ，温州“蛾”（疑） $n_i$ ，广州“弥”（明） $n_i$ 等等，各字音声母的例外，都是因为泥、日、疑、明母等鼻音声母的发音部位转移而造成的。这种音变虽然只涉及到部分字，但也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西安话“女猫”中“女”字声母的例外就是这一规律的表现。泥母字“女”声母的正常演变正是受到这一规律的干扰，才变成了 $n$ 。不过从河北滦县、定兴等方言母猫叫“假妮猫”的情况来看，“女”字的声母在变成 $n$ 以前，韵母先要由 $y$ 变成 $i$ ，然后声母再发生变化。因此变化过程应该是

$$ny \quad ni \quad mi$$

另外，不同音变规律的影响也表现为一种感染作用，即同一音类中的语音成分在不同语音条件下发生不同音变，其中个别字音本来应该按甲条件变化而却被乙条件所感染，因而成为例外。例如汉语方言上声字中全浊上字普遍和浊去字合流，归入去声（阳去）调，清上字和次浊上字则另有变化方向。但有的方言个别清上字和次浊上字因为受全浊上字音变规律的影响，也归入了去声（阳去），例如长沙话清上字“捅” $t'_{an}$ ，广州话次浊上字“老”（细老）

lou 都在本方言中成为例外。

## 2. 词语不同使用频率引起的差异

同一音类中的不同字音 因为组成的词语使用频率不同 各字音自身的变化是否发生以及变化速度的快慢也就不同。以北京话为例。“内 馁 嫩 磨”等泥母蟹臻撮合口字 由于发音部位靠前的声母和韵尾的共同影响，舌位偏后的介音 *ɤ* 逐渐趋于不稳定，多数字的韵母开始由合口韵向开口韵转变。如下表所示：

内	nei	nei
馁	nei nuei	nei
嫩	ɾən nɛn	ɾən
磨	nɛn	nɛn

指五十年代的情况。“内”字只有开口韵一读 已经完成了介音 *ɤ* 失落的音变过程；“馁”、“嫩”兼有开口合口两读 说明正处在音变的过程中；“磨”则没有发生音变。②指九十年代的情况。“馁”、“嫩”和“内”一样也已经只有开口韵一读 但“磨”仍然保持合口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词汇扩散”的现象。四字中“内”、“嫩”是常用字；“馁”、“磨”是非常用字。就上述例字看 北京话使用频率高的字音比使用频率低的字音变化快，说明词语使用频率的不同造成了音变规律的例外。

## （四）语音变化的系统性及其表现形式

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拥有相当数量的语音成分。它们因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分成种种集合和组合，即种种大小不等的类。语音成分的变化要受语音条件的影响，同类语音成分的变化要受同一语音条件的影响。因此方言中语音成分的变化主要

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由行动，而是声韵调各个不同层级的集群的集体性变化。也就是说，语音变化要受语音系统的制约，具有系统性。

一般所说声韵调的集群，声母方面有系、组、清浊、全清次清、全浊次浊，韵母方面有韵腹、撮、等，韵头（开合、洪细），韵尾（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声调方面有舒（平上去）、入、平仄（上去入）等等。对有的方言来说，以上反映中古音韵结构的集群还不一定都能说明所有的语音变化，需要在方言现代语音系统的基础上再补充归纳集群，如送气不送气、四呼等。

语音变化的系统性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 1. 合流和分化

合流指本来不同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的音值逐渐变得相近以至相同，结果是语音系统中减少了一类声母、韵母、声调或它们间的配合。如苏州话细音前精组见组声母字在不同年龄层口音中的读音：

	老	青
济(精)~ 计(见)	tsj <sup>1</sup> ≠ tɕ <sup>1</sup> i	tɕ <sup>1</sup> i = tɕ <sup>1</sup> i
妻(清)~ 溪(溪)	tɕ <sup>1</sup> si	tɕ <sup>1</sup> tɕ <sup>1</sup> i = tɕ <sup>1</sup> i
齐(从)~ 奇(群)	ɕz ≠ ɕz	ɕzi(ɕzi) = ɕz <sup>1</sup> i
西(心)~ 希(晓)	ɕsi	tɕ <sup>1</sup> i = tɕ <sup>1</sup> i
徐(邪)	ɕzi	ɕz <sup>1</sup> i(ɕzi)

精组字声母老年人口音保持为舌尖音“，济妻齐西”和见组字“计溪奇希”不同音，保持尖团音的区别；而青年人口音精组字声母腭化成舌面前音，上述两组字同音，尖团不分。这样，苏州话细音前的精组见组声母就通过老年人口音向青年口音的过渡完成了合流，尖音字消失。

分化指原来同一声母、韵母或声调的字音经历音变而不再相同。比如湖北大多数方言见组细音字声母是舌面前音 tɕ tɕ<sup>1</sup> ɕ，但

广济话见组字声母虽然在齐齿韵前仍然是舌面前音，在原撮口韵前却变成了卷舌音：

今  $t_{\text{e}}in$  欠  $t_{\text{e}}'i\text{ẽ}'$  希  $c_{\text{e}}$   
 军  $t_{\text{e}}\text{ɣ}_{\text{e}}\text{ə}n$  劝  $t_{\text{e}}'\text{ɣ}_{\text{e}}\text{ẽ}'$  虚  $c_{\text{e}}\text{ɣ}_{\text{e}}$

这样，广济话见组细韵字声母就以齐撮韵的不同为条件发生了分化。

## 2. 平行发展及平行的破坏和重建

本来同组的声母、韵母或声调经历音变后仍然保持同组，叫做平行发展。如前述苏州话齐撮韵前的声母  $ts$   $ts'$  在青年人口音中变成  $t_{\text{e}}$   $t_{\text{e}}'$   $c_{\text{e}}$  保持了声母发音部位的一致；广州话咸撮合口三等唇音字“帆”“乏”韵尾由  $mp$  变成  $ŋ$   $t$  保持了韵尾发音部位的一致，都属平行发展。

但同组的语音成分如果在音变过程中遇到不同的语音环境，也有可能变得不再同组，这就出现平行的破坏。比如吴方言区大部分方言晓匣母字声母在开合口韵前是  $h$   $ɦ$  发音部位相同，属于一组，但在齐撮韵前发音部位不同，晓母是舌面前音  $c_{\text{e}}$ ，匣母是舌面中半元音  $j$ ， $c_{\text{e}}$  和  $j$  不同组。例如苏州话：

孝 晓 )  $c_{\text{e}}\text{a}\text{e}$   
 效 匣 )  $ji\text{e}'$  耀 ( 喻 )

晓匣母音变中平行的被破坏，原因在于晓母字声母  $h$  在腭化成  $c_{\text{e}}$  的过程中没有遇到方言音系中其他语音成分的干扰，而匣母字声母  $ɦ$  则在腭化的中途受到声母  $j$  (喻) 的吸引而和它合流，不能再向前腭化成和  $c_{\text{e}}$  同组的  $z$ ：

$h$   $X_j$   $C_{\text{e}}$   
 $ɦ$   $j$   $j \rightarrow z$

匣母字声母的这一音变现象和吴方言喻母字音节不以纯元音起头而具有声母  $j$  (和 ) 有关。老湘语喻母字仍然保持以纯元音起头，匣母字声母的变化情况就完全不同。例如娄底话：

孝 晓)  $\text{ei}^2$

效 匣)  $\text{z:i}^2$  耀 喻)  $\text{i} -$

晓匣母声母在腭化过程中都没有受到外来干扰：

$$\begin{array}{cccc} \text{x} & \text{x}_j & \text{ç} & \text{ç} \\ & \text{j} & \text{j} & \text{z} \end{array}$$

x 变成  $\text{ç}$  腭化后仍然同组 保持了平行。

又如苏州话流摄字“走”、“酒”的读音，老年人口音中韵母是  $\text{ey}(\text{Y})$   $\text{iey}(\text{Y})$  开齐两呼构成一组韵母。但青年人口音“走”字韵母变成 ei，“酒”字韵母变成 y 或  $\text{i}_\text{e}$  分属不同韵组。这是因为开口呼韵母  $\text{ey}$  由圆唇元音变成不圆唇音的 ei 后，同组齐齿呼韵母的变化受到苏州方言韵母的介音和韵尾不能同是高元音  $\text{i}$  的限制，无法同步变成  $\text{iei}$ ：

$$\begin{array}{cc} \text{ey} & \text{ei} \\ \text{i}_\text{e} \text{y} & \rightarrow \text{iei} \end{array}$$

于是  $\text{i}_\text{e} \text{y}$  只能并入音近的韵母 y (“酒”=“举”)或  $\text{i}_\text{e}$  (“酒”=“捲”)，因而平行被破坏。

平行破坏后，韵母系统会变得凌乱不整齐。不过系统化是语音的内在要求。在某些方言中，平行破坏后也有可能某种程度上重新建立起来。以赣方言效摄字一等“保”、二等“饱”、三四等“标条”知照二等“抄梢”、三等“潮烧”和流摄字一等“头”、三等“酒优”知照二等“愁”、三等“周收”的韵母为例：

	保	饱	抄梢	二	潮烧	三	标条	头	愁	二	周收	三	酒优
武宁 au			iau			iau			iao		iu		iu
峡江 au			u			iau			u		iu		iu
宜丰 au						əu			i u		əu		iu
南昌 au			u			i u			eu		əu		iu

以上效流摄知照三等字属齐齿韵的特点保存在赣方言的中心地区。不过各地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如武宁泉口话效摄字特点保存

完好，但流摄字开口韵转为齐齿韵，平行发展受到损害。峡江话效摄知照三等字分化出韵母  $\epsilon u$ ，但因为可以并入流摄，所以平行破坏后得以迅速恢复。宜丰话效流摄知照三等字都分化，虽然由效摄分化出的韵母  $\epsilon u$  并入流摄，但由流摄分化出的韵母  $\epsilon u$  却和原开口韵  $\epsilon u$  重叠，两摄韵母不仅平行发展被破坏，而且韵母多样，韵组凌乱。南昌话效流摄知照三等字分化情况和宜丰话相同，但韵母音值已有调整，有  $\epsilon u$ 、 $\epsilon u$  和  $\epsilon u$ 、 $i u$  两个新的组合，只剩效摄原开口韵  $au$  成为孤韵。赣方言知照三等字韵母的分化是声母在官话影响下由舌面前音向舌尖音变化的结果。因此，只有在知照组声母的音变全部完成以后，效流摄韵母平行发展的破坏和重建过程才会终止。

再以部分吴方言梗摄字“棚硬兵经横”和宕摄字“帮娘光旺”江摄字“江”的韵母为例：

	棚硬二	兵三经四	横二	帮一江二	娘三	光一	旺三
苏州	$a_0$	$in$	$ua_0$	$o_0$	$i_0$	$lo_0$	$io_0$
宁波	$\tilde{a}$	$i_0$	$l\tilde{a}$	$\tilde{o}$	$\tilde{a}$	$l\tilde{o}$	$l\tilde{i}$
绍兴	$a_0$	$i_0$	$ua_0$	$o_0$	$i_0$	$lo_0$	$io_0$
松阳	$a_0$	$in$	$ua_0$	$o_0$	$i_0$	$o_0$	$io_0$

从上表看，各方言韵组的平行发展都经历过破坏和调整。其中梗摄开合口二等和开口三四等字的韵母早期应该是  $a_0$ 、 $i_0$ 、 $ua_0$ ，但齐齿韵除因照三字声母演变及个别字介音失落使韵母转为开口呼从而得以保留主要元音  $a$  如苏州“声” $ʃa_0$ 、“盛” $ʃa_0$ ，松阳“柄” $pa_0$ ，此外都已经和深臻曾摄齐齿韵  $in$ 、 $i_0$  合流。如苏州话：

英(庚) 嬰(清)  $in$  = 音(侵) = 因(真) = 应(蒸)

$i_0$  组韵母因此失去了齐齿韵，平行发展被破坏。宕江摄字早期韵母如苏州话应该是  $o_0$ 、 $io_0$ 、 $lo_0$ 、 $iu_0$ 。在梗摄  $ia_0$  变成  $in$ 、 $i_0$  以后，宕摄的韵母  $i_0$  随即调整而音变成  $ia_0$ ，使  $a_0$  组韵母复归完整，重建平行。而以后宕摄合口三等韵  $iu_0$  音变成  $io_0$  也使  $o_0$

组韵母恢复完整 重建平行。表中松阳话情况和苏州话相同 而绍兴、宁波方言中虽然宕撮合口三等韵没有发生上述音变 但通过另一途径 江摄见晓组声母字的文读 又重新出现了齐齿韵 如绍兴“降”(投降)  $i_0\eta$  , 宁波“降”(降落)  $te_1i_0$   $te_1ya$ 。总的来看, 由于语音的系统性要求而产生的调整活动, 使吴方言早期  $a_0$   $\eta$  两组韵母的平行发展在破坏后都告恢复。以苏州话为例, 这一过程可以假设如下:

$a_0$   $i_0\eta$   $ua_0$   $ua_0a_0$   $\eta$   $i_0\eta$   $a_0$   $\eta$   
 $\eta$   $i_0\eta$   $\eta$   $\eta$   $i_0\eta$   $a_0\eta$   $ua_0\eta$   $iu_0\eta$   $T_0\eta$   $\eta$   $u_0\eta$

### 3. 整化

语音系统中某些凌乱不成系统的语音成分, 在音变过程中有可能和音值相近的语音成分合并, 整化成一个系组。例如闽北话深臻曾梗摄和咸山摄字的韵母:

	明	深	年	仁	延	寒献
建瓯	$mei_0$	$ts'e_1\eta$	$nu_0$	$\eta$ $\eta$ $\sim$ $ie_1\eta$	$\eta$	$ku_1\eta$ $xy_1\eta$
松溪	$me_1\eta$	$ts'e_1\eta$	$mi_0$	$ie_1\eta$	$ie_1\eta$	$ku_1\eta$ $xy_1\eta$
建阳	$mei_0$	$ts'i_1\eta$	$nie_1\eta$	$u_0$	$ie_1\eta$	$ku_1\eta$ $xy_1\eta$

从各方言的例字可以看出, 由两个都不完整的  $ei_0$  组韵母和  $\eta$  组韵母整化成一个四呼俱全的  $ei_0$  组韵母的过程, 是逐步进行的。

建瓯话  $ei_0$  组韵母只有开口齐齿呼  $e_1\eta$   $ie_1\eta$  两个,  $\eta$  组韵母只有齐合撮韵  $h_0$   $ui_0$   $y_0$  三个, 都不完整。不过  $ie_1\eta$  韵母字在零声母条件下又读  $ie_1\eta$  如“仁”  $\eta$   $\eta$   $\sim$   $ie_1\eta$ , 显示出整化过程已经开始。松溪话  $ei_0$  组韵母则已经扩及到齐齿呼全部零声母字和合口字:  $ie_1\eta$   $ue_1\eta$  整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ta$  组韵母只剩齐撮韵  $h_0$   $y_0$  减少了一个合口韵。建阳话则  $ei_0$  组韵母更扩及到齐合撮三呼:  $ie_1\eta$   $ue_1\eta$   $ye_1\eta$  虽然还保存有部分  $i_1\eta$  韵母字, 但四呼俱全的  $ei_0$  组韵

母已经出现。综合三个方言的情况来看，整化实际上表现为韵母  $i_1$  中韵腹元音  $i$  (如果把  $i_1$  标写成  $i_1$  的话) 复化成  $e$  的音变。而推动这一音变的，则是不完整的韵母重组成新的完整的组合的要求，就中反映了语音变化中系统化的力量。

#### 4. 链移

链移指音系中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具有某种关系的多个声母、韵母或声调 向着同一方向变化 而大致保持彼此原有的关系，表现为 A 变成 B, B 变成 C, C 变成 D 等，或 B 变成 A, C 变成 B, D 变成 C 等。这种音变并不是成组的语音成分的同步变化，而是不成组的语音成分连成一个系列作递进式的变化，所以也称为音移或连续式音变。

链移中音变的动力来自音链一端的某个语音成分。如果这个语音成分发生变化 变得和语音系统中另一个语音成分相似 它就有可能迫使这另一个语音成分也发生变化，以免和它混同。这个语音成分进而又再迫使另一个语音成分发生变化，从而引发连锁反应。这种因排斥而引发的音变叫做推链。相反，如果这个语音成分变成和语音系统中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不相同的新形式，它就有可能吸引语音系统中的某一语音成分来填补自己变化后留下的空缺，使它变得和自己原来的形式相同，进而再引发连锁反应。这种因吸引而引发的音变叫做拉链。由此可见，链移也是语音系统性制约下的产物。

汉语方言中推链式音变并不多见。现在以吴方言、老湘语和徽州方言中蟹 一 二等 假果遇等摄字的韵母为例。它们早期的音值可能和今北京话的  $ai$   $a$   $o$   $u$  等相近。由于蟹摄 一 二等字的韵母在上述方言中单化成  $a$ ，这个单元音  $a$  进入假果遇摄韵母的单元音行列，就可能产生推挤的作用，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元音变化，造成各种长度的链移。以下列方言为例：

太（蟹）巴（假）破多（果）铺都（遇）

北京	ai			aou
太平	a	ɔ	o	u
绍兴	a	o	o	u
双峰	a	o	u	u(əu)
上海	a	o	u	u
苏州	ɔ	o	u(əu)	u(əu)

如上表所示，北京话蟹摄一二等字韵母仍然是复元音，因此不存在推链式音变，可以作为其他音变方言的参照。表中其他方言蟹摄一二等字韵母都单化成了低元音 a(ɔ)，这就对假摄字的韵母构成压力，迫使它的舌位高化。安徽太平话假摄字韵母元音因此变成 ɔ，但链移到这里就停止。绍兴话假摄字韵母元音则继续高化，和果摄字韵母 o 合流，链移到这里也停止。双峰话假摄字韵母推动果摄字韵母音变成 u，果摄字韵母又推动遇摄字中舌尖音声母字韵母由 u 变成复元音 əu，链移进行到了终点，同时又保持了各摄韵母间的区别，是音变进行得最完满的。上海话假摄字韵母则推动果摄字韵母元音高化，使它和遇摄字韵母 u 合流。苏州话假摄字韵母推动果摄字韵母和遇摄字韵母合流成 u 后，还使其中舌尖音声母字韵母都变成复元音 əu。在这里，上海、苏州方言假摄字韵母表现出了巨大的推动力。以上各方言音变中的低元音高化和高元音复化，离开链移，将是难以找到音变条件的。

拉链式音变目前所见更少。现在以闽方言海南文昌话声母的变化为例：

	保	地	苏	祖醋
厦门	ˈpo	tʰi	ɛ	ˈtɕ
文昌	ˈbo	ɬi	ɬau	ˈtɕ

表中以厦门话和文昌话相比较。两方言例字的声母不同，其中厦门话声母的音值可以代表文昌话早期的情况。文昌话声母音变的动力来自原清塞音声母 p t p 首先变成吸气音 ɬ ɬ 这是当地

非汉语的临高话等影响的结果。然后 t 留下的空缺吸引了原 s ts 声母 在以 a q u 为韵腹元音的开合口韵母前 再变成 t 再以后声母 s 留下的空格又吸引原 ts' 声母变成 s。这样，链移先后经历按如下顺序进行的三个阶段，得以完成：

① p t b d

② s ts t

③ ts' s

以上声母中辅音超越集合关系的变化，不从链移着眼，也是难以说明的。

### 5 类推

类推是指某个语音成分自身并没有发生音变的条件，只因为原来同组的声母、韵母或声调发生了变化，就随着也发生了变化。以北京话见系开口二等见溪晓母字和影母字声母为例：

家（见）掐（溪）虾（晓）鸦（影）

tɕia      tɕ'ia      ɕia      dia

见溪晓母字“家掐虾”的舌根音声母 k k'、x 在开口二等韵前元音的影响下腭化成舌面前音 t<sub>ɕ</sub> t<sub>ɕ'</sub> ɕ，同时韵母也因为声母舌面前音的影响衍生出一个前高元音 i 作为介音，声母韵母的音变同步完成“掐”字还经历了入声韵尾脱落的过程，这样的音变在音理上是容易说明的。但影母字“鸦”并没有同样的声母作为语音条件，韵母却也由开口韵变成了齐齿韵。根据近人的研究，在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腭化的元明时期，影母字音节已经不再有 ʔ 声母，而是以纯元音起头，其中三四等字已经和喻母字合流。也就是说，影母已经不存在引起可能腭化的语音基础了。这就很难解释“鸦”字韵母的低元音 a 为什么会变为 ia。可以设想，“鸦”和“家掐虾”的韵母本来同组，在“家掐虾”等字的韵母变成 ia 以后，为了保持同韵，“鸦”的韵母随着也变成了 ia。这种音变应该是类推的结果。

类推也有由词义相关引起的。例如方言中的人称代词：

	我	你	佢
广州	ʔ <sup>55</sup>	nei <sup>55</sup>	-kəy
梅县	ai <sup>55</sup>	n <sup>55</sup>	Ki <sup>55</sup>

人称代词上声字“我”、“你”和平声字“佢”在上述两个方言中变得声调相同。广州话的“佢”受“我”、“你”的影响变成阳上调，梅县话的“我（佢）”、“你”受“佢”的影响变成阳平调，都是类推的结果。不过这种因词义的影响而发生的类推只能作用于个别字音，不能影响到整个音类，因此在音变中的作用不大。

综上所述，语音变化的系统性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们在语音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一般说，平行发展、类推使语音系统得以保持原有的基本格局，分化、合流、整化使语音系统简化或繁化，链移则常常造成语音系统中的特色。通过这些不同的音变方式，方言语音在长期演变后可以和原来大不相同。但不管变化怎样，由于音变的规律性，古今汉语语音之间总是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二十至二十三章）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 陈昌仪：《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
- 房德里耶斯：《语言》（第一编第二章），岑麒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